

# 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初探

樊小红

**内容提要** 1991年西亚德政权垮台以来,索马里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中,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始终未见成效。对旷日持久内战的厌倦情绪、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占领区的相对稳定、外部干预及影响等因素刺激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迅速崛起,同时也使索马里国家建构形势更趋复杂。由于与苏菲主义和部族传统相悖,及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构建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国家的设想缺乏思想和社会基础。伊斯兰激进组织已成为影响索马里未来和平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民族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建立囊括各派力量的政府,有意识地加强国家认同,弱化部族界限,索马里才能最终实现长久的稳定与和平。

**关键词** 索马里 伊斯兰 激进组织 国家建构

**作者简介** 樊小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辑(北京 100007)。

1991年西亚德政权垮台后,索马里很快碎片化,陷入军阀混战中。期间,随着各部族军阀力量分化整合,索马里人也不断进行着重构国家的努力,并于2004年成立了过渡政府,但终因无力控制各派势力、难以实施有效管理而形同虚设,索马里事实上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2009年伊斯兰激进组织<sup>1</sup>的迅速崛起,使部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索马里内战形势更趋复杂。本文拟以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为线索,对该派别迅速崛起的原因和政治诉求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前景等问题作粗浅分析。

## 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兴起及其政治主张

### (一) 索马里政治重构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分化

1991年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以部族为基础的武装迅速涌现,最多时达几十个派系,经过近20年的分化与整合,索马里形成了几派主要力量。北部是事实上独立、但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索马里兰;西北部是半独立的国家邦特兰;南部则成为军阀为争夺权力和地盘而混战的角斗场。内战爆发不久,国际社会即开始斡旋努力,索马里各派也进行了多次和谈,试图重建国家。1993年,联合国召集索马里14个派别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民族和解会议,90年代中期又进行过数次和谈,埃塞俄比亚、埃及、肯尼亚等也试图调解,都未能取得实效。2000年在吉布提召开的和会,为过渡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004年过渡政府在肯尼亚内罗毕建立,成立了议会,通过了宪章,但并未使混乱局面有所改善,各派军阀仍旧各行其是,冲突不断,过渡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管理,索马里政治重构的尝

<sup>1</sup> 关于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界定,参见李群英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106页。

试事实上失败。

2006年，伊斯兰法院联盟占领了之前一直为军阀所盘踞的摩加迪沙及索马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伊斯兰主义开始受到人们关注。在索马里，伊斯兰主义的历史并不长，19世纪的萨里希亚运动是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伊斯兰改革运动。<sup>1</sup> 1899~1920年，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领导的抗击殖民主义者斗争，效仿苏丹马赫迪运动，主张纯洁伊斯兰，也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现代意义的伊斯兰主义则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生活在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等中东国家的索马里人受到各种伊斯兰思潮（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和瓦哈比主义）的影响，并将这些思想带回索马里。1989年成立的阿尔-伊蒂哈德是较重要的伊斯兰主义组织。21世纪伊斯兰法院联盟在索马里取得的胜利将伊斯兰运动推向高潮，但引起了邻国埃塞俄比亚的不安，于2006年出兵打散了伊斯兰法院联盟。伊斯兰法院联盟成分复杂，既有伊斯兰主义者，也有商人和部族首领，伊斯兰主义者中又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自2007年起，面对新的内战和外部形势，法院联盟内部意见不同，出现分化。一部分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开始与过渡政府谈判，并与大部分军阀达成妥协，于2009年1月组建了新的过渡政府；而持更强硬立场的伊斯兰青年运动等激进组织则分裂出来，并于2009年2月与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彻底决裂。5月，伊斯兰青年运动占领乔哈尔（Jowhar），过渡政府在6月告急，向国际社会求援。短短一年时间，伊斯兰激进组织就基本控制了索马里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摩加迪沙的18个街区中，只有7个由过渡政府掌控。至此，在索马里形成了孱弱的、基于部族主义却无力控制各路部族军阀，只因得到美国等一些国际力量支持而勉强维持的过渡政府，与控制大部分地区、但不被美国等所认可的激进组织间形成僵持、对峙的局面，索马里国家重构又一次陷入困境。索马里内战在经历了军阀混战、军阀与伊斯兰主义者间的对抗后，演变为军阀——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联盟与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斗争，军阀混战与意识形态之争相互交织。

## （二）主要伊斯兰激进组织及其政治主张

索马里主要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有伊斯兰青年运动（Al-Shabaab）和伊斯兰党（Hizbul Islam）。伊斯兰青年运动，最初是伊斯兰法院联盟的青年军事组织，2006年从伊斯兰法院联盟中分离出来，改称现名，主要领导人是阿登·哈什法拉·阿罗（Adan Hashi Ayro），有军事和法律两个下属组织，在各地还有分支机构。伊斯兰党于2009年2月4日由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再解放联盟（Hassan Aweys' Ars-Eritrea）、伊斯兰阵线（Islamic front）等几个组织合并成立，<sup>④</sup> 主要领导人是艾维斯。伊斯兰法院联盟在2006年底被埃塞俄比亚军队打散后，成立了重新解放索马里联盟，2008年中分裂为两部分，谢里夫主张和谈，艾维斯则主张继续斗争，之后，两人分道扬镳，谢里夫成为过渡政府总统，艾维斯则主导了伊斯兰党，并被视作精神领袖。

伊斯兰青年运动和伊斯兰党在政治主张上都认同理想的索马里应该是一个严格实施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实现伊斯兰统治是最终目标，伊斯兰圣战是主要手段；在对外关系上都强调建立包括欧加登地区在内的大索马里国，实现索马里民族的统一。伊斯兰青年运动被认为由新一代的索马里伊斯兰主义者控制，更多受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思想所影响，而不是索马里部族领导的原教旨主义观念。<sup>⑤</sup> 他们实施自杀式袭击，建立训练营，青年运动的训练既是军事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并吸引了不少外国具有国际野心的崇尚吉哈德的人加入<sup>⑥</sup>。与青年运动相比，伊斯兰党尽管也得到了不少来自阿富汗、美国以及中东一些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但在使用自杀式袭击、建立全球吉哈德等问题上持不同看法，不少人认为艾维斯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sup>1</sup> See Ioan M.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8, p. 16.

<sup>④</sup> See "Discord Among Hizbul Islam Faction", March 24, 2009, <http://allafrica.com>.

<sup>⑤</sup> See Milan Vesely, "Somalia On the Horns of a Dilemma", *The Middle East*, June 2009, Issue 401, p. 19.

<sup>⑥</sup> See Daveed Gartenstein-Ross, "The Strategic Challenge of Somalia's Al-Shabaab", *Middle East Quarterly*, Fall 2009, Vol 16, Issue 4, p. 34.

关于激进组织的资金来源,较普遍的观点是,他们从流散在外的索马里人、富有的海湾阿拉伯人及厄立特里亚等处接受钱和武器。也有人认为他们通过税收和海盗收益,以及阿拉伯人和流散在外的索马里人的捐赠,从而获得大量现金。<sup>1</sup> 2008年8月,东非海员援助计划负责人安德鲁·姆万古拉(Andrew Mwangura)宣称,青年运动使用海盗资金资助圣战,“根据我们的信息,他们从海盗那得到的资金资助了青年运动的活动。”

### (三) 伊斯兰激进组织兴起的原因

应该说,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促成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迅速兴起。从国内看,正如总部设在美国的“索马里维护公正中心”主任奥马尔所言:“伊斯兰激进组织利用人们对暴力和战争的厌倦情绪取得了民众对他们建立在伊斯兰教义基础上的政权的支持”。历经近20年的内战,人们依然看不到和平的曙光,对现状的绝望使索马里人开始选择极端方式,而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在所控制的地区提供社会服务和福利,秩序相对稳定,也使不少人选择容忍其激进的宗教措施。前索马里军事官员的一段话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索马里激进势力兴起的原因,“安拉最终会来拯救我们。我们作为冷战的代理人战场,作为地区战场,我们现在在内战。我们呼吁其他人来帮助我们,但没人来,最终我们寄希望于安拉。我们让他给我们石油,这样就可以让美国人对我们感兴趣;否则,我们说,我们需要来自阿富汗的战士。”<sup>④</sup> 战争毁掉了整整一代人,对部分在战乱中长大的索马里年轻人来说,参加青年党是摆脱无助状态的一种途径。<sup>(四)</sup>

较强的战斗力是促使伊斯兰激进组织崛起的另一个原因。伊斯兰青年运动本身是伊斯兰法院联盟的军事组织,在伊斯兰法院联盟控制索马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时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决裂后,伊斯兰青年运动继续战斗,很快夺回了在埃塞俄比亚军队支持下被过渡政府占领的地区。伊斯兰激进组织中有一些成员是为钱而来,但也有不少为信仰而战者参加,并成为中坚力量。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一些索马里人加入青年运动部分是被这个组织的创始人阿登·哈什法拉·阿罗非凡的领导能力所吸引,他们相信他是真正的圣战士,他激起了索马里人的希望和捍卫他们的宗教,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勇气。这也是尽管他已经被美军炸死,但仍然有不少追随者的原因。

从外部因素看,国际极端组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美国的打击下,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正渗入到一些较贫穷、政府较弱的国家和地区,非洲也成为极端组织关注的地区。索马里因长期战乱和无政府状态,更被国际极端势力视为理想场所。许多流散到欧、美国家的索马里年轻人难以融入所在国家,如在美国的索马里人,其受歧视和被边缘化的难民经历,使他们转而投身索马里的圣战中寻求慰藉。<sup>1/4</sup>

外部势力介入也成为刺激激进势力发展的催化剂。因长期与邻国埃塞俄比亚不和,索马里人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深恶痛绝。<sup>1/2</sup>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华盛顿办公室的非洲问题专家布朗温·布鲁顿(Bronwyn Bruton)指出,对极端主义者来说,外国干涉是他们凝聚的力量。

## 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政治诉求面临的挑战

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严格执行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并已在其控制的地区开始实践。从目前形势看,尽管他们控制着索马里中、南部大部地区,在战斗力上也占据优势,但其构建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伊斯兰国家的理想,仍然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适合的国际环境,面临国内、国

<sup>1</sup> See “Jihadists Attack Somalia Al-Qaeda on the March”, *The Economist*, Vol 391, Issue 8632, May 23th-29th 2009, p. 49.

<sup>④</sup> Jon Lee Anderson “The Most Failed State”, *The New Yorker*, Dec. 14, 2009, Vol 85, Issue 41, p. 75.

<sup>(四)</sup> See Robert Draper “Shattered Somalia”, *National Geographic*, Vol 216, Issue 3, Sep. 16 2009, p. 76.

<sup>1/4</sup> See Michael B. Farrell “A US Pipeline for Jihad in Somalia?”, Dec. 30 2009, <http://allafrica.com>.

<sup>1/2</sup> See Sean Miller “American Terrorists in Somalia”, *National Journal*, August 1, 2009, p. 52.

际多重挑战。

### （一）苏菲主义传统使激进势力缺乏思想基础

从宗教传统来看，伊斯兰教是国教，但长期以来在索马里穆斯林中盛行的是苏菲主义，苏菲主义奉行较温和的政策，主张忍耐和非暴力。与中东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不同，索马里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参与程度并没有那么深。长期以来，苏菲学者主要在解决民事纠纷、主持婚礼、宗教仪式等社会事务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较好地融合到部族政治中。而伊斯兰激进组织则主张严格按伊斯兰教义治理国家，视苏菲主义为异端，反对苏菲教团的圣徒、圣墓崇拜，并付诸行动，摧毁苏菲陵墓。青年运动摧毁了拜多亚城的几座墓，谢赫·易卜拉辛·阿登（Shek Ibrahim Aden）称他们将继续摧毁索马里南部的墓地，<sup>1</sup> 这些举动引起苏菲派的不满，苏菲宗教领袖号召人们从青年运动手中解放摩加迪沙。<sup>④</sup> 现任总统谢里夫说：“这个宗教是忍耐的宗教，并不像其他派别那样严厉”。虔诚的索马里人现在已经意识到青年运动和本·拉登已经褻渎了他们的信仰，以前，由于封闭，他们并未认识到这一点。<sup>④</sup> 布鲁顿说：“从某种程度上说，索马里人民是我们的财富，青年运动的行为是非索马里的……你们不应该做的是让人们将青年运动看做是抵御外敌的力量。”这些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在索马里并没有深厚的生存土壤。

### （二）部族传统使激进势力缺乏政治和社会基础

索马里是以部族为社会基础的国家，宗族、血缘关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也是决定该信任谁、该恨谁、该和谁战斗的依据，人们寻求部族而非政府解决问题。政客靠部族忠诚延长政治生命，军阀靠部族支持来增强军事实力，甚至包括商人，也更多是依据部族而非宗教来做重大决定。索马里国内主要由4个游牧部族迪尔（Dir）、达鲁德（Daarood）、伊萨克（Isaaq）、哈维耶（Hawiye）和两个农业部族迪吉尔（Digil）、拉汉文（Rahanwain）组成。尽管在独立初期及西亚德统治初期，索马里政府曾试图弱化部族势力，提出不考虑部族和宗教，每个公民有权生活和耕作在他选择的地方，禁止政党使用部落名字。<sup>④</sup> 但到西亚德统治中后期，部族政治意识进一步得到加强。

不同于伊斯兰温和派融于部族传统的做法，强硬派在这样一个部族政治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强调不以部族为界限，而以宗教为宗旨，组成多部族的军事组织，挑战部族政治传统。穆克塔·罗博（mukhtarobow）曾在演讲中说，这块土地属于安拉，任何在此实施伊斯兰法的人都可以统治它。<sup>⑤</sup> 一些具有传统权威的长老势力在内战中不断受到削弱，势必招致一些部族军阀的不满，而伊斯兰主义者乃至后来强硬派的胜利更是引起了受美国支持的一些世俗军阀及部族长老的恐慌，由此出现了此前打得不可开交的各路军阀联合起来，将矛头对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局面。对伊斯兰激进组织而言，在这个部族传统浸入骨髓的国家想完全摒弃部族政治是不现实的。

### （三）自身问题及内部分裂削弱了激进势力的力量

与伊斯兰法院联盟相比，伊斯兰青年运动等组织的主张更偏激，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不容许人们带金银饰物、播放音乐，实施石刑等。在古老的沿海城镇，伊斯兰青年运动甚至宣称镶金、银的牙齿是非伊斯兰的，一旦发现就要把它们从人们的嘴里拿出来。<sup>④</sup> 这些严厉的宗教措施不易被索马里人认同，已开始引起不少人的反感。

随着内战的继续，激进组织内部的分化和斗争也开始显现，两个主要的激进组织间近来因意见分歧和争夺领导权而冲突不断，内部分裂削弱了激进势力的力量。伊斯兰主义组织远不是一个统一的整

<sup>1</sup> See “Al-Shabab Destroys Graves in Bay Region”, March 4, 2010 <http://www.alkfrica.com>.

<sup>④</sup> See “Mwutingal-Qaeda’s Somali Allies: The Next Jihad”, *The Economist*, July 4th–10th, 2009, Vol. 392, Issue 8638, p. 39.

<sup>④</sup> See Jon Lee Anderson, *op. cit.*, p. 67.

<sup>④</sup> See Loan M. Lewis *Blood and Bone: the Call of Kinship in Somali Society*, the Red Sea Press, Inc. 1994, p. 144.

<sup>⑤</sup> See Daved Gartenstein-Ross *op. cit.*, p. 32.

<sup>④</sup> See Jon Lee Anderson, *op. cit.*, p. 66.

体, 如果没有外敌需要共同对抗他们会很快分裂。<sup>1</sup> 两者的斗争目标也有分歧, 一种是在索马里建立伊斯兰国家, 另一种是把索马里作为全球伊斯兰圣战的一个阶段。<sup>④</sup> 高层伊斯兰主义军事指挥官对于频繁使用自杀袭击也意见不一, 如伊斯兰党的艾维斯就对此提出批评。<sup>⑤</sup> 对彼此分歧的危害, 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也有清醒认识, 并试图弥合。艾维斯强调, 一个组织瞧不起另一个组织并没有什么好处, 会影响圣战事业。如果分歧升级, 各个组织各行其是, 将会使全球吉哈德事业误入歧途。<sup>⑥</sup>

#### (四) 缺乏国际认同

国际社会的卷入使索马里内战形势更趋复杂。美国认为, 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与“基地组织”间有联系, 早在2008年, 美国就认定青年运动是国际恐怖组织, 宣布艾维斯、阿罗等为恐怖分子。因此, 打击激进组织、保住过渡政府, 避免极端势力向地区外泛滥是其索马里政策的核心。在美国看来, “如果这个政府垮台了, 我们将面对一个被青年运动控制的力量, 他会为本·拉登和其他外国圣战者提供庇护, 如果这样, 将不只是索马里的混乱, 周边国家将支持代理人战争, 这个地区将变成一团混乱”<sup>⑦</sup>。为此, 美国不顾联合国禁令, 公然向索马里过渡政府提供武器。

埃塞俄比亚则因担心索马里激进组织的大索马里政策威胁到其国家利益而支持索马里过渡政府, 索马里内战中不少派系的背后都有埃塞俄比亚的支持。并在其认为必要时不惜亲自出兵, 如2006年派军队进入索马里, 击败了伊斯兰法院联盟武装。肯尼亚境内有大量索马里难民, 且担心索马里局势对国内极端势力的影响, 也对索马里激进组织防范有加。

因此, 美国和埃塞俄比亚不会坐视伊斯兰激进组织在索马里国内坐大, 更不能容忍一个由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统治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出现。<sup>⑧</sup> 近期联合国出台的对厄立特里亚高官财产冻结、旅游禁令及武器禁运等<sup>⑨</sup>制裁决议就是试图打压索马里激进组织。

## 伊斯兰激进组织与索马里国家建构

### (一) 伊斯兰激进组织在索马里政治中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 在索马里, 部族而非伊斯兰激进组织是主要问题。事实上, 如同谈阿富汗不能无视塔利班一样, 伊斯兰激进组织在索马里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它的发展也有高潮和低谷时期。如在2006年, 埃塞俄比亚出兵时, 伊斯兰激进组织似乎表现得不堪一击, 仅仅两周就作鸟兽散, 但事实是他们不做更多的抵抗, 消失在乡村,<sup>⑩</sup> 之后很快卷土重来, 到2008年埃塞俄比亚从索马里撤军前, 伊斯兰主义者已将索马里南部大部分失地重新夺了回来。因此, 想当然地撇开它谈索马里和平是不现实的。伊斯兰青年运动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无论用武力, 还是谈判, 这是一个索马里复杂的部族政治的产物, 决定着国家各种力量的平衡。<sup>⑪</sup> 有观点认为, 要想建立一个安全、和平的国家, 就必须把青年运动伊斯兰主义者纳入在政府中; 没有他们, 就没有和平的希望。<sup>⑫</sup> 这些提法为索马里伊斯兰

<sup>1</sup> See Andrew Bast, “It’s Time to Leave Somalia”, *Newswave*, Aug 3 2009, Vol 154, Issue 5, p. 9.

<sup>④</sup> See “Government Readies Troops for Al-Shabaab Assault in Mogadishu”, March 6 2010, <http://www.allafrica.com>.

<sup>⑤</sup> See Scott Baklauf, “Ethiopian Troops Return to Somali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2 2009.

<sup>⑥</sup> See “We are Different From Al-Shabaab, Says Hizbul Islem Rebel Chief”, <http://www.allafrica.com>.

<sup>⑦</sup> Jon Lee Anderson, *op cit*, p. 68.

<sup>⑧</sup> 有学者曾撰文论及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 参见张湘东: 《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 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 第48~53页。

<sup>⑨</sup> See “Shoul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mpose Sanctions on Eritrea for Supporting Insurgents in Somalia?”, *International Debates*, Jan 2010, Vol 3, Issue 1, pp. 2-3.

<sup>⑩</sup> See Scott Baklauf, “Kenya Poised to Intervene in Somali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5 2009.

<sup>⑪</sup> See “Somalia’s Civil War – Just a Glimmer of Hope?”, *The Economist*, Feb. 28th–Mar 6th 2009, Vol 390, Issue 8620, p. 45.

<sup>⑫</sup> See Milan Vesely, “Somalia on the Horns of a Dilemma”, *The Middle East*, Jun 2009, Issue 401, p. 19.

激进组织的未来做了清晰的注解。而对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而言，更好地融入索马里政治中，也应该是它的最佳选择。

## (二) 索马里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与前景

索马里内战持续了近 20 年，成为继苏丹内战后又一场马拉松式的内战。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有着同一语言、民族及宗教的国家，和平与稳定却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要探寻索马里政治动荡的原因及其重建之路，有必要从国家结构入手。从严格意义上讲，在索马里从来就没有过现代民族国家，而只是一个部族国家。<sup>1</sup> 部族政治造成的后果是部族认同大于民族国家认同，国家缺乏凝聚力，是索马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诱因之一，也成为其未来国家重构中不能回避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根据国家建构理论，国家权力在于社会，必然要与基于特定历史、现实环境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保持适度平衡。<sup>④</sup> 因此，索马里未来的国家重建应在融合各种本地意识、符合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基础上，逐步有意识地强化国家认同而非部族认同，增强国族意识，探索适合索马里国情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这是最终实现索马里和平与稳定的制度基础。

当然，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上的，要以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发展为前提，在尚不能被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索马里，落后的前现代化经济决定了上述目标的实现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族主义，更确切地讲应该是国族主义在民族国家建构中起到了很好的凝聚作用，而在索马里，伊斯兰（而不是极端意识形态）能成功整合各种社会元素，并提供稳定的有能力应对国家紧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需求的政府。<sup>⑤</sup> 现居华盛顿、为《索马里时报》撰文的贾迈勒（Jamal Gabobe）说，伊斯兰青年运动和它的联盟为索马里破碎的国家提供了解决方案，“如果有一种适合索马里的模式，那就是伊斯兰。”在几乎全民皆是穆斯林的索马里，伊斯兰教更易于被广泛接受，可以成为从思想上提升凝聚力的工具。过渡政府也切实提高了伊斯兰主义在国家中的地位，2009 年国会新增的 275 个席位由伊斯兰主义者占据。对索马里各派而言，坐下来和谈、建立各派别都充分参与的国家体制是实现和平的途径。然而在目前的索马里，由于常年内战，旧有的部族政治调节机制被破坏，而新的有效调节机制尚未确立，从而陷入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及部族矛盾交织的困境中。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机制上，尚不具备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将各族群整合在一起的政治权威。过渡政府自身的软弱，显然难以承担整合各种政治势力的重任。面对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威胁，部分军阀尚能与过渡政府合作，一旦失去共同敌人，极有可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伊斯兰激进组织则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力量的不均衡、强烈的宗教信仰及民族主义情结，使该激进派别难以认同在美国等外部势力支持下才得以维持的过渡政府。此外，索马里兰问题也是索马里国家建构和实现和平的棘手问题。索马里兰“总统”曾说：“把大索马里的梦想放在一边，让我们做个好邻居。”对于索马里兰的“独立”，民族主义者和吉哈德主义者强烈反对。<sup>⑥</sup> 因此，目前索马里胶着的内战状态还将持续，各派力量分化组合也仍将持续，索马里国家建构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sup>1</sup> See Abdulahi A. Osman and Issaka K. Souare ed., *Somalia at the Crossroads: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on Reconstituting a Failed State* Adonis and Abbey Publishes Ltd 2007, p. 52.

<sup>④</sup> 参见段志超：《国家权力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对政党政治的影响》，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 年第 5 期，第 51 页。

<sup>⑤</sup> See Abdulahi A. Osman and Issaka K. Souare ed., *op. cit.*, p. 53.

<sup>⑥</sup> See “Somalia’s Civil War: Just a Glimmer of Hope”, *The Economist*, Feb. 28th–Mar. 6th, 2009, Vol 390, Issue 8620, p. 44.

## The Sheikh School and Its Political Theory

*Wang Feng*

pp. 32– 37

The Sheikh School was the non-mainstream teachings school of 12 Imam Shiite tribe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origin of conformation of the Sheikh School was that the Shiite believers lost their patience for a long time i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clusive Adventist Imam. One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Sheikh School w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hiite ideas and Sufism in history and later Sufism

was stripped out from the mainstream Shiite thought. The thought of Isfahan School also had an impact on Sheikh School, but there were also huge differences among them. There are great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unique doctrines of Sheikh School and the thought of the mainstream teachings of 12 imams, and which form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apua Movement and the Baha'i sect.

## Exploration of the Somali Islamic Radical Militant Group

*Fan Xiaohong*

pp. 38– 43

Since the fall of Siad Regime in 1991, Somalia has been in the warlord era, and effort of the national building has not met with success. Such factors like the weary of protracted civil war, the relatively stability in occupied Islamic radical area, influenc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spurred the rapid rise of Islamic militant groups, which also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of Somalia more complicated. The ideology of building the fundamental Islamic state was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social basis, and

contradict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Sufism and tribal inconsistent, the Islamic group won no recognition from US-l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But the Islamic group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building Somalia state and will make great influence in future. The Long-term stability and peace in Somali should be based on establishment of a powerful central government including all political forces, strengthening of the identity of Somalia nation, and weakening of the tribal boundaries.

## Zheng He'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Oceans and Contemporary China's African Policy

*Li Xufeng*

pp. 50– 57

Zheng He's seven voyages to western oceans and four of them boarded on Africa which reached the top of Sino-Africa relatio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voyages had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which set a good communication sample between nation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this historical incident also formed a good basis for developing contemporary Sino-Africa relation. Contemporary China's African policy, like Zheng He's voyages, relies on friendly exchanges, emphasizes on high-level visits, complies with equality, mutual benefits and complementary principles of trade policy and relations, as well as exchanges in which the embodiment of hard-working

messengers fulfill their duties to serve their country in the spirit context, reflects the core val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ame strain. Compared the assistance of building of Tanzania-Zambia Railway with the voyages of "thick to thin to", we can clearly fi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African relation in 600 years and 60 years of heritage and discarded. Of course, contemporary China's African policy is far beyond the era of Zheng He limitations, which has strategic, interactive, international and other notable features, and China's Africa policy has fulfilled sustainable, stabl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